

畬族从聚居民族变成散居民族的历史考察

蒋炳钊

历史上，畬族是一个聚居的民族，现在则变成“大散小聚”的散居民族。而且聚居区也从原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变成现在以闽东、浙南地区为主。古今聚居地发生很大变化，这是畬族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本文就这些问题试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斧正。

一、唐宋及以前闽粤赣三省交界地是畬族及其先民的聚居区

共同地域是民族形成的首要条件。福建的漳州、汀州和广东的潮州、梅州以及江西的赣州，俗称闽粤赣三省交界区。历史上这些地区地域毗连，生态环境相似，森林繁茂，高山叠起，交通比较闭塞。根据考古资料，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的遗址发现。商周及战国秦汉时代的印纹陶文化大量出土，说明这一地区很早就有住民在这里生活着。这些原始住民属于哪个民族？据《史记》、《汉书》载，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封

赵佗为南越王。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又诏曰：“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西汉刚建立，汉高祖刘邦为“和辑百越，毋为南边患害”，先后封了无诸、赵佗和织为闽越王、南越王和南海王。这三个异姓诸侯王各有其封地（即统治的地域）。史载闽越王“都冶”，其政治中心应在闽北，辖有今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和赣东一部分。南越政治中心在番禺（今广州），辖有今两广及海南等地。南海王的封地在哪里？史家有异议，清代全祖望考订在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①杨澜《临汀汇考》一书亦赞同此说。他说：“今武平县本长汀也。唐置州后，以本州西南境的南安、武平二镇，观其命名之意，因南武二字分析并举，当时因其地为汉南武侯织所封也。宋升镇为县，乃专武平之名，而其地正在汀、潮、赣之间。全氏南海境中有地名南武之说，此其是也。”^②今人潘蔚《汉南海王织考》一文作了详细的考证，其结论亦与全氏雷同。他说：“织自称为南武侯，武侯，海上之豪语也，以此威其众。织所据也，在今江西之东南以迄福建之西南，界于闽越和南越之间。”^③南海王国的封地界于闽越和南越之间，即在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的观点是可信的。

秦汉以前，我国东南地区的古代民族泛称“百越”。《吕氏春秋·恃君》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瓚言：“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百越”一名是在越国灭亡之后出现。从考古资料也得到证实，在我国东南地区大量出土一种在陶器器表拍印几何印纹纹饰，考古专家把它称之为印纹陶文化。1978年在江西庐山召开“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创造印纹陶文化的主人就是古越人，并认为这种文化它是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相当于中原的商周，衰落于战

国秦汉。^④这与百越各民族的形成发展与消亡的历史是相符合的。因此，闽粤赣交界地区的南武侯织“亦越之世也”的记载是可信的，其族人亦为百越族之一。

公元前111年和前110年汉武帝先后统一了南越和闽越之后，这些百越民族政权从此在历史上逐渐消失。但是各地百越族人仍大量存在，后来由于历史原因，则出现不同的名称。如东汉时出现“山越”一名，《三国志·吴志》大量出现“山越”记载。《资治通鉴·汉记》胡三省注曰：“山越本亦越人，依山阻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是知汉晋时代的“山越”便是秦汉时代的“百越”的后裔。孙吴统治的地区大都就是原百越民族的居住地。

从福建各地区的民族史考察，闽北建安郡是孙吴政权镇压该地区“山越”反抗之后于吴永安三年（260年）“以会稽郡南部为建安郡”。闽北是汉人入迁最早的地区，建安郡也是福建首置的郡治。而漳、汀地区则不同。唐总章二年（669年），唐高宗为了“靖边方”，先后派出陈政、陈元光父子统率大量唐军进入漳州，企图实行军事统治，但是屡遭当地“蛮僚”强有力的抵抗，在“诛之难于屡诛，徙之难于屡徙”的情况下，陈元光于唐垂拱二年（686年）上书朝廷，增建“一州于泉、潮间，以控岭表”。^⑤漳州设治四十多年后，唐王朝又根据福州长吏唐循忠建议，“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户，奏置州，因汀溪为名”。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郡汀州。漳、汀是福建设治最晚地区，从而反映该地汉人迁入较晚，土著民较为聚居的地区。因此，三国时闽北地区的土著民称为“山越”，而唐代漳、汀地区的土著民则被称为“峒蛮”、“蛮僚”、“蛮夷”。《资

治通鉴·唐纪》载：“(唐昭宗乾宁元年)是岁，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黄连峒，在汀州宁化县南，今潭飞际即其地)。”《丁氏古谱》载，六朝以来，九龙江两岸“尽属蛮僚”。^⑥与漳州相连的潮州，唐代也是“蛮夷”之地。《旧唐书·韩愈传》载，韩愈被贬至潮州当刺史，他自叹曰：“处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居蛮夷之地，与魍魅为群。”唐代在闽粤赣交界区内的住民被称为“峒蛮”、“蛮僚”、“蛮夷”。有的方志的作者认为他们就是古代的山越。如广东《南海县志》、《嘉应州志》：“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隋书·南蛮传》曰：“南蛮杂类……古先所谓百越是也。”由此可知，隋唐时代，东南地区出现许多名称不一的民族都同古代百越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从上述，隋唐时期，闽粤赣交界地仍是百越后裔“蛮僚”的聚居地。它与南宋出现“畬民”关系如何？刘克庄(1187—1269年)《漳州谕畬》曰：“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徭、曰黎、曰疍，在漳者曰畬。西畬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畬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畬民不悦(役)，畬田不税，其来久矣。”^⑦从这个记载至少说明三个问题：1.南宋出现的“畬民”，其居地在当时福建的漳州、汀州和广东的潮州、梅州以及江西南部的赣州，即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2.南宋畬民的分布区与唐代“蛮僚”的住地完全相同，说明宋代的“畬民”与唐代“蛮僚”的关系密切；3.唐代已先后在“蛮僚”地区设治，直至宋代畬民仍不归顺，不断展开斗争，才会出现“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畬民不役，畬田不税，其来久矣”的记载。从而反映当时在聚居区的蛮僚(畬民)还是人多势大，才有力

量抗拒唐军的进犯。

从史实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唐总章二年,蛮僚啸乱。”这是唐高宗时陈政率唐军入漳立即遭到当地“蛮僚”武装反抗的事。669年陈政率3 600将士入漳,“几经交锋”,陈政不得不认输。他上书朝廷:“群蛮来侵,自以众寡不敌,退保九龙山,奏请益兵。”唐王朝立即又派其兄陈敏、陈敷“领军校五十八来援”。敏、敷二人在途中死去,由其母魏氏“代领其众入闽,乃进师屯御梁山之云霄镇”。^⑧陈政之子陈元光随祖母入漳。陈氏家族倾家而出,但仍挽救不了败局。仪凤二年(677年),陈政病死,陈元光受命“代领其众”。此时蛮僚首领苗自成、雷万兴率众抗击唐军,“守帅不能制”。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又爆发一次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首领是30年前被陈元光镇压的雷万兴和苗自成的儿子,斗争更为惨烈。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十一月,由蓝奉高率领的一支武装队伍直接与陈元光对垒,陈即被蓝“刃伤而卒”。在近50年的斗争中,蛮僚打败了以陈政、陈元光父子为首的唐军的屡屡进犯。

陈元光死后,其子孙先后继任。陈氏四世守漳达一百多年。后来驻漳的唐军也大都就地落籍。双方的斗争持续不断展开,蛮僚人民的抗争从未停止过。

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漳州地区畬民又掀起规模巨大的反抗斗争,并向统治中心地漳州市区进发。“群盗益深,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甚矣。”宋王室急忙派著作郎兼左曹郎官卓侯前往漳州征剿,他一到漳州,见到“一城红巾满野,久戍不解,智勇俱困”。于是变换招抚手法,派人到处张贴榜文:“畬民亦吾民也,前事勿问,许其自新。”《漳州谕畬》一文就是这样出笼的,“畬民”一名因此始见史书。

从上两例史实说明：1. 唐宋及以前，闽粤赣三省交界地是畬族及其先民的聚居地。虽然唐以后有汉人迁入，但原住民还占大多数；2. 唐代的起义队伍都是有组织的，且得到当地族人的大力支持，才能持久与唐王朝相对抗。说明这些蛮僚应是当地的原住民，绝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言他们是唐初才从外地迁入的。^⑩3. 宋代出现的畬民，其来源主要是由唐代的“蛮僚”发展形成的，为百越民族的后裔，尤与汉代南武侯侯这支越人关系最为密切。

民族的来源和形成是相当复杂的。就畬族而言，聚居区的土著民应是畬族来源与形成的主体。但是在其形成过程中并不排斥融合其他民族的存在，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唐代在汀州、潮州和赣南还有一种古老民族“山都、木客”，由于他们居住于荒山野岭，罕与外界接触，故被称为神鬼怪物。宋以后，山都、木客在这些地区消失了，他们可能融合于蛮僚之中，成为畬族先民的一部分。^⑪此外，唐宋时，有一部分汉人入迁该地，并与当地蛮僚相处或通婚而成为畬族，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至于有部分武陵蛮或是瑶人迁入，因为缺乏史书记载，但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可能性。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不是构成畬族来源的主体。

二、宋元时期畬族人民的抗争与被迫开始向外迁徙

随着汉人的入迁和封建郡县在畬区的设治，民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如漳州地区已从畬民“散处之多”逐渐变成“民僚杂处”之地。^⑫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广大畬族人民便成为被剥削者。如汀州设治后，强迫当地人民缴纳“贡赋”。^⑬唐昭宗乾宁年间（894—898年）曾派官吏“劝农桑，定租税”。^⑭畬族

先民不堪重负，随即发生宁化“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的战事。

两宋以来，随着封建剥削的加重和官吏贪饕更加引起畬族人民的不满和抗争，尤其是南宋时期更加剧烈。史载，高宗建炎年间的漳浦，绍兴十五年的江西虔州、广东梅州及福建等地，均先后爆发畬民起义。^⑨宁宗嘉定元年江西的李元励和宋宗时赣州的钟全和陈三枪为首的起义规模较大，尤其是理宗景定二年漳州畬民大起义反抗斗争更为激烈。这次起义的原因，《漳州谕畬》一文作者刘克庄也坦言：“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畬人不堪，诉于郡弗者，遂怙众据险，剽掠省地。”官逼民反，都是由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引起的。

宋末元初，畬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又掀起一次高潮。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元兵破汀州，时独揽泉州市舶大权的蒲寿庚“导元倾宋”，投降元朝。这时以陈吊眼为首漳潮一带畬族人民配合宋将张世杰，讨伐蒲寿庚，并展开声势浩大的抗元斗争。杀死元朝驻漳州招讨傅全和万户府知事阙文兴。起义军由最初的一万多人发展到“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扼险自固”。建立“昌泰”年号，提出“复宋”口号，坚持六年的斗争，掀开了畬民抗元斗争的序幕。

在元代，畬民持续不断的反抗斗争，在《元史》及其他史书均有不少记载。除陈吊眼外，其中比较主要的还有黄华、钟明亮等。1278年，“建宁政和人黄华，集盐夫，联络建宁（闽北）、括苍（浙南）及畬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⑩黄华领导起义军有众几十万，剪发文面，号“头陀军”（《元经世大典序录》作“陀头军”）。他们以“复宋”为号召，称祥兴五年（祥

兴为赵昺年号),武装斗争坚持了六年。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以广东循州钟明亮为首的起义军,其声势比起陈吊眼、黄华领导的起义军规模更加浩大,各地畬民纷纷起兵响应,武装斗争坚持五年,给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正如当时福建闽海提刑按察使王恽向朝廷的报告中所说:“福建所辖郡县五十余,连山距海,实为边徼重地,而民情轻诡。自平定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聚,愚民因而蚁附,官兵致讨,复蹂践之甚……时行省讨剧贼钟明亮无功。恽复条陈利害曰:‘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今剧贼猖獗,又酷于华,其可以寻常草窃视之。况其地有溪山之险,东击西走,出没难测,招之不来,攻之不克。”^⑩

元顺帝时期,元统治者已处于风雨飘摇的时代,各地畬族的抗元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如至元三年(1337年),有广东增城的钟大明和福建黄二使、李志甫领导的畬民起义。“至元丁丑,畬民黄二使逆命,郡兵追破之,余党李志甫结聚南胜(今南靖)不能拔。朝廷命重臣,征发四省兵以讨之,历四载,经百余战,兵老民疲。”^⑪至正十一年(1351年),南胜县吴仲海领导下的抗元队伍,杀死元朝千户福良,攻占南胜县。至正十八年(1358年)陈友谅领导农民军入闽,畬民起兵响应。至正十九年(1359年),南胜县畬汉两族人民又在李国祥、陈角车等领导下,并联络安溪的李大、同安的吴肥以及广东的王猛虎等队伍,陷南诏(今诏安县)、长汀、龙岩、漳浦等县。^⑫畬族人民持续不断的抗元斗争最后与全国人民的抗元斗争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畬族抗元斗争与以前的斗争有些不同,不仅规模大,时间

持续很长。它能在民族矛盾的情况下，以“复宋”为号召，来激发群众的斗争情绪；有的起义队伍还设有年号，已带有政权性质。同时，在斗争中充分认识到武装的重要性，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畬军”。史家都把这段历史写进《中国通史》，可见它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抗元斗争失败后，畬族人民遭到严重摧残，从此之后聚居区内的畬民未见再有大规模的抗争行动。赣南地区畬族，在宋元时期未见有成规模的反抗斗争记载，却继承元代畬民的抗争精神，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有畬民谢志珊、蓝天凤等领导的江西横水、左溪、桶冈的赣南畬民大起义。“有名大寨三十余处，拥众数万，盘踞三省。”此次斗争被镇压之后，赣南畬民历史活动便很少见于史书。

从上所述，从唐总章二年（669年）开始至1368年元朝灭亡的近七百年间，聚居在漳、汀、潮等地的畬族及其先民持续不断地与统治者展开斗争以及明代赣南畬民大起义，在历史上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历史事实，一方面为畬族人民谱写下光辉的历史篇章；另一方面也对畬族历史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1. 畬族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的损失。历史上畬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最终都遭到统治者残酷的镇压，无数的起义将领均遭到杀害，根据地的人民也遭受杀害，财产被洗劫一空。如钟明亮起义军一事，元朝合四省兵镇压。“师之所经，寇之所及，男女老稚被执，资财庐舍罹荡毁者甚多。”^⑨又如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赣南畬民大起义，王守仁调集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九府官兵一万二千多人和大量地方武装，“两月之间，通计捣过巢穴八十余处，擒斩大贼首谢志珊、蓝天凤等

八十六名颗，从贼首级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颗，俘获贼属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夺回被虏男妇八十三名口，牛马骡六百八只匹。赃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银一百一十三两八钱一分，总计首从贼徒属牛马赃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颗口只件”。^⑨仅以官方统计，起义者被杀达三四千人，大量财产被掠夺。

2. 强迫同化。历代统治者为实现对畬民的统治，在军事控制的同时，往往采取强迫同化和分化瓦解畬族内部的措施。如唐代的陈元光，“乃率众辟地置屯，招来流亡”。“渐成村落”，使畬地变成“民僚杂处”。就是一种采取移民加以同化。又如唐军落籍漳州后，强迫娶当地畬女为妻。畬民深知他们是镇压祖先的罪人，又出于无奈，提出“红白事”一起办，即结婚时新娘穿的衣服是“内白外红”，意即先戴孝后结婚。闽南地区新娘内穿白衣或随嫁一套白衣孝服的习俗可能渊源于此。

宋代大都是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如南宋景定二年漳州畬民大起义，当时西畬龙溪最大的畬长名叫李德，所谓“德最反复杰黠者”是也。于是统治者千方百计先招抚他，这位有影响的人物“纳款”后，“于是西九畬酋长相继受招。西定，乃并力于南”。漳浦的“南畬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⑩统治者采用逐个分化瓦解，削弱畬族人民的抗争力量，导致起义的失败。同时统治者还诱惑这些被收买的头头为统治畬区的代理人，达到“以畬制畬”的目的。这种分化瓦解畬族人民的统治政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实录》载：“（永乐十五年十一月）广东畬蛮雷纹用等来朝。初，潮州卫卒谢辅言：‘海阳县凤凰山诸处畬蛮，遁八山谷中，不供徭赋，乞与耆老陈晚往招之。’于是畬长雷纹用等凡四十九户，俱愿复业。至是辅率纹用等来朝，命各赐钞三十锭，彩币一，

表里绀绢衣一袭。赐辅、晚亦如是”。^②

流放起义军家属。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月,元廷“遣扬州射士戍泉州。陈吊眼父文桂及兄弟桂龙满安纳款,令护送至京师……(至元二十年)六月,流叛贼陈吊眼叔陈桂龙于憨答孙之地”。^③

收编畬军及其将领。至元二十年(1284年),先是“放福建畬军,收其军器,其部长于近处州郡民官迁转”。^④第二年九月,“令福建黄华畬军,有恒产者为民,无恒产与妻子编为守城军”。^⑤又诏“以宋畬军将校授管民官,散之郡邑”。^⑥

采用屯田置民于军人监督。皇庆元年(1312年)十一月,元廷“调汀、漳畬军,代亳州等翼汉军于本处屯田”。^⑦成宗元贞三年(1297年),“命于南诏黎、畬各立屯田,调拨见戍军人,每屯置一千五百名,及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入屯,与军人相参耕种为户。汀州屯一千五百二十五名,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为田,汀州屯二百二十五顷,漳州屯二百五十顷”。^⑧

3. 畬民被逼从聚居区内逐渐向外迁徙。历史上畬族的迁徙活动时常存在,但大都是在聚居区内进行。至宋元时期,由于武装起义被镇压,统治者采取种种的压迫和歧视政策,分散和瓦解畬族内部的团结力量,畬族人民被迫向外迁徙。从史书记载看,元代以前,畬族的活动主要还是在聚居区以内。直至宋末元初,在聚居区外的泉州、邵武、安溪等地则见有畬民反抗斗争的事。如元朝占领福建后,元世祖下令“招谕漳、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畬官兵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加迁赏,军民安堵如故”。^⑨宋末元初黄华在闽北领导抗元,其中有大量“畬军”。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安溪土贼张大老、方德龙聚畬洞,为一方之患,垂三十年”。^⑩这些“畬民”

应是从漳汀地区迁出去的。说明宋元时期，畬族已从原来的聚居区迁出，畬族历史从此开始发生变化。

三、明清时期形成畬族新的聚居地

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畬族总人口368 823人，其中福建省208 495人，约占总人口57%，分布在全省64个县市；其中以宁德地区最为集中，有166 941人，占全省80%。浙江省有147 573人，占畬族总人口的40%，分布在浙江省约40个县市，其中温州地区有50 166人，丽水地区有68 233人，浙南地区畬族占该省畬族总人口的78%。江西省有7 420人。广东省有3 205人。安徽省有1 112人。居住都很分散。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国畬族人口增至630 378人，其中福建349 052人，浙江省173 250人，江西省76 607人，广东省26 511人，安徽省2 357人。八年间畬族总人口增加近26万，这与20世纪80年代新恢复一批畬族民族成分有关，福建增加的14万多人中有一半是新恢复民族成分的。

从上述人口数及其分布现状看，畬族的聚居区已经转移到闽东、浙南，古今居住区已有明显不同。居住很分散，不论是聚居或散居的畬族村都比较小，一般都在几户至几十户，周围是汉族村，也有的村落是畬、汉杂居在一起。1984年6月成立的我国第一个畬族自治县——浙江省景宁畬族自治县，全县畬族人口只有1.6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5%，5个行政区都有畬族。这种分布格局大约是在明清时期形成的。新的聚居地如何形成，旧的居住区人口为什么大量消失，究其原因是由于畬族的向外迁徙、被迫同化、畬汉融合的结果。

1. 迁徙。闽东的畬族主要是从漳、潮一带迁来的。见于畬

族族谱记载：“唐光启二年（886年），盘、蓝、雷、钟、李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乡导官，由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时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畬民协助王潮、王审知攻打泉州、福州，而后往连江、罗源迁徙。这是畬族迁往闽东最早的记载。这一记载与王潮、王审知率光、寿二州数千人入闽的路线与史实是符合的。但这只能作为一次军事行动。根据地方志记载，迁往闽东、浙南的畬族大都是在明清时期。明谢肇淛《五杂俎》载：“吾闽山中有一种畬人……福州、闽清、永福（今永泰）山中最多。”^⑩他在《游太姥山记》又记下福鼎的畬族，“过湖坪，值畬人纵火焚山”。他还写下“畬人烧草过春分”的诗句。^⑪《罗源县志》载：“（万历）三十九年，群虎伤人，知县陈良谏禱于神，督畬民用毒矢射杀四虎，患方息。”^⑫傅恒《皇清职贡图》云：“古田畬民即罗源一种，散处在上洋等村。”此外，《永泰乡土志》、《侯官乡土志》、《古田县乡土志略》、《古田县志》、《霞浦县志》等，均有该地畬民活动的记载。特别是清代《福安县志》对该县畬族居住的村庄有很详细的记载，该县在清代已有畬族村庄二百多个。^⑬从史书记载，可以推断，明清时期闽东各县普遍都有畬族村庄。

根据闽东畬族传唱的《高皇歌》，广东潮州凤凰山为他们始祖居地，故迁往闽东的畬族大都来自漳、潮地区。迁徙路线有一条是主要的，即从潮、漳经泉州、莆仙、福州（闽侯）而转入闽东。据晋江丰山《蓝氏族谱》和《雷氏宗谱》记载，泉州双髻山畬族是明代自漳州迁来的，后来有一部分蓝姓再迁往仙游，一部分雷姓迁惠安。明周华《兴化县志》载，万历十七年（1589年）该地曾发生了畬客雷五领导的反抗斗争。乾隆版《仙游县志》亦载该县已有“语言自为一种”的畬民。

其次是闽北。南宋时，黄华已领导畬军在闽北开展斗争。现在三明和南平地区畬族大都也是明清时期迁去的。据调查得知，永安县半岭蓝姓畬族是从上杭庐丰迁去的。三明的畬族据说也是从上杭迁去的。建阳地区畬族大部分是从三明迁去的。也有一部分来自福州。《建阳县志》和《南平县志》均有该县畬民活动的记载。漳平县的山羊隔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迁去的。此外《永春县志》、《德化县志》都有畬民记载。据1982年统计，福建畬族分布区以宁德地区最多，有166 945人，其次是建阳地区20 616人，莆田地区1 428人，龙溪地区959人，还有少量散布于全省各地。

迁往浙江的畬族，据《景宁畬族自治县概况》云，惠明寺保存《唐朝元皇南泉山迁居建造惠明寺报税开垦》资料，在永泰二年（即大历元年）丙午岁（766年），已有雷太祖进裕公一家5人与僧昌森子清华2人，经罗源到浙江处州府青田县开垦之事，如属实，也只是个别事例。浙南与闽东毗连，迁往浙江的畬族必须经过闽东，或是从闽东再迁入。《景宁县志》载：“畬民自粤而闽，以暨处之遂（昌）、云（和）、龙（游）诸邑，皆有其人。”^⑤《遂昌县志》曰：“遂邑之有畬民，盖于国初时徙自广东，安插于衢、处、温三府者。”^⑥又据浙江《遂昌钟氏创修家谱志》中的《行程簿》记载，其祖先钟集洪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从潮阳迁出，“迁迁往往，徐徐而行”。至钟大孙这一代，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迁往漳州南靖。景泰元年（1450年）又迁泉州同安县。景泰八年（1457年）又迁入安溪。天顺五年（1461年）再迁福州连江。成化十年（1474年）再迁入罗源。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钟氏子孙二十八口，迁至浙江处州景宁县二都锦岱洋地方居住。^⑦迁入浙江的畬族

也是在明代。至清代畬民已遍及今温州、丽水等地区,《处州府志》载,畬族在“处郡十县尤多”。^⑧

此外,安徽宁国县东南部少量的畬族是清代从浙江迁入的。宁国县畬族《蓝氏宗谱》载,同治八年(1869年)浙江蓝姓畬族迁至蓝溪,大约在清光绪年间才迁入宁国县。

又据江西省人民政府民政厅《铅山、贵溪畬民历史调查报告》云,铅山县畬族相传祖籍广东潮州凤凰山,后迁到福建宁化县再迁入铅山县陈坊区大沅乡狐狸岩居住,时间约在明末清初。贵溪县畬族相传也是从广东迁入福建,于清雍正、乾隆年间迁入贵溪。

从畬族迁徙的情况,它具有自发性的特点,大都是一家一户从一个地方再向另一个地方迁徙,“迁迁往往,徐徐而行”,因而才形成如此“大散小聚”的分布格局。

2. 强迫同化。上面说到,畬族历史上不间断的反抗斗争遭到失败,都是由于统治者靠军事围剿和政治上强迫同化。尤其是反元斗争失败后,畬族遭到严重的摧残。明清时期统治者全面加强了对畬族人民的统治。如在汀州“畬即承赋如居民”。“其有田产者亦必输粮而给官居”。^⑨王守仁镇压赣南畬民大起义后,在城乡推行“十家牌法”(即“十家连坐”),一人犯上“十家均罪”,对畬民进行严密的控制与监视。入清以来,对迁往各地畬民就地采取“编图隶籍”,推行保甲制度。有的畬区还设“畬官”、“畬长”,即利用畬族头头充当,达到以畬制畬目的。这样一来,畬民只能与汉人一样,就地纳粮供赋。所以自清代以后,畬民已不可能进行长途的迁徙活动。此外,对畬民采取歧视政策。如不准参加科考,畬民流传《钟良弼》歌谣,即道出嘉庆初福鼎县童生畬民钟良弼上书“呈控诉县书串

通监生诬指畬民不准与试”^⑩，丑化他们的盘瓠信仰，强迫畬民改变民族服饰。据《华美报》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曾下令畬民要改装，“自示之后，该山民男妇等，务将服式改从民俗”。^⑪在这种民族高压政策之下，为了生存，有的畬民被迫改换姓氏。傅衣凌《福建畬姓考》一文，从史书记载中列出畬族姓氏约有二十多个，如今只有三四个，就是盘、蓝、雷、钟四姓氏，有的也改从汉姓，如《闽都别记》载，有的将雷姓改为螺姓。《枣林杂识》载，汀州畬族将盘姓改为潘姓，雷姓改为菱姓。《春明梦余录》载，闽中畬族也有将盘、雷二姓改为潘、吕。一部分被迫同化，也是造成畬族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

3. 自然同化。据史书记载，明清时期在闽粤赣交界区内还有畬民活动，如《天下郡国利病书》云：“漳徭人（徭人应为畬人——笔者注）与虔、汀、潮、循接壤错处，亦以盘、蓝、雷为姓。随山插种，去瘠就腴，编荻架茅为居。善射猎……今酋魁亦有辨华文者。”^⑫《汀州府志》、《嘉应州志》、《潮州府志》、《临汀汇考》等方志亦见记载。但从行文看已不是当年主体民族的情况，而是辟处山林，“每山不过十许人，鸟兽聚散无常所”。估计人口已经不多。据新中国成立之初畬族人口统计，广东只有2 000多人，福建的漳汀地区也不足5 000人，大都融合于汉族之中。

民族间的自然同化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随着汉人大量入迁，在汉文化作为主体文化的进程中，畬、汉两族人民长期相处、通婚，产生融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客家”的出现。据罗香林《客家源流考》提出客家先民南迁闽粤赣三省交界地，最早始于唐末五代，宋元时汉人又大量迁入。何谓“客家”，有的学者认为：“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

之后也。”“客家文化就是中古汉族民间文化。”客家本是北方土著居民，辗转南迁易地为“客”。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不够全面。客家先民有一支是南迁的汉人；“客家”是形成于畬族的聚居区内，故有一部分是来源当地畬民。因此，客家文化是畬、汉两族文化互动的产物。^⑨客家人的服饰和山歌明显具有畬文化的特征。昔日畬族的聚居区，今日成为客家聚散大本营。这个新的族群产生，其中包容了大量的畬族人口。1988年上杭卢丰、官庄两个乡恢复畬族成分，就是从客家人分离出来的。

漳州地区与汀州有些不同。自唐代以来，陈氏家族统治一百多年，又有大量唐军落籍。至宋代，汉人入迁人数大大超过汀州。交通较方便，社会经济较发达，长期以来与潮汕地区形成“福佬系”。因有这一股力量的存在的原因，故该地不是客家的形成区。于是生活在这一带的畬民更早被汉人同化，故《漳州府志》、《漳浦县志》记载畬民活动历史大都是元代以前的事，明清时代的事已少有提及。如清代漳浦赤岭涌现出蓝理、蓝迁珍、蓝鼎元几位著名人物，在清代的史书中都没有把他们作为畬族人物记载。1984年恢复赤岭、湖西两个乡的群众为畬族，得知他们与龙海的隆教乡和广东大浦乡都是一祖所分的兄弟，是明代从隆教乡迁出的后裔。由于单姓蓝，遵循“同姓不婚”的训诫，故蓝氏族人一开始便同周边汉人通婚，导致本民族的语言、服饰及宗教信仰都淡忘了，完全接受当地汉文化，同化于汉族之中。

明清时代从聚居区迁出的畬族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化于汉族中。如1984年恢复的安溪官桥、厦门钟宅、惠安钟厝的畬族成分，原因也是单姓钟，也是一祖所分的兄弟，他们长期与汉人通婚，融合于汉族之中。还有一些地方，如迁往永春、德化的

畬族，在清代的县志还有记载，但由于人数少且分散。“今具遵制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异。近又与土民联婚，并改其焚尸浮葬之习，亦足见一道同风之化云。”^④《建阳县志》亦载该县畬民，“所居在从箐邃谷，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始见一舍，无比屋而居者……近惟嘉禾一带余（畬）民，半染华风。欲与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亦读书识字，习举子业”。^⑤逐渐被汉化。

从上述所述，自唐代以来，畬族历史发生很大变化，从单一民族的聚居区变成汉畬杂居地，后来又从杂居地更换新的聚住区，从一个土著民族变成为汉族统治下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原因是由于汉文化统治地位的日益扩展与稳固。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对畬族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畬族从一个聚居的民族变成为一个“大分散小聚居”的散居民族；加速了畬族与汉族社会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过程；同时也使畬、汉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密切。这是畬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

1958年，参加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到过闽东、浙南一些畬族村庄，看到他们显明的民族服饰、族谱、祭祀用的祖图、祖杖和听不懂的民族语言，民族的文化特征很突出。为什么在这一个新的聚居区内能保留如此明显的民族文化？原因之一，闽东地区是一个山区，社会经济在福建省当中发展比较缓慢。畬民“结庐深山，务耕作”，寻找到生存的空间，而且人数相对集中。其次盘瓠信仰的保留与流传产生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所以在这区域内的畬民不易被汉人同化。再者，畬族中雷、蓝、钟、李几个姓都有，可以互相通婚，繁衍后代。

畬族从聚居民族变化成为散杂居民族，是经历了很长的一个历史过程。唐宋时期基本上还是聚居，外迁的人极少数。宋末元初畬民掀起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失败可能是一个转折点。故明清时期是畬族外迁的一个重要时期。从历史上看，畬民向外迁徙都是自发性，是一家一户地进行，“缓缓而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因而造成居住地十分分散。闽东、浙南地域相连成为新的聚居地，可以说是一条主要迁徙路线。

注释：

- ①全祖望：《鮑埼亭集·经史问答》。
- ②杨澜：《临汀汇考》卷一《方域》。
- ③潘蔚：《南海王织考》，见《文史汇刊》第一卷第2期。
- ④《文物》，1979（1）。
- ⑤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五·汀州》。
- ⑥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八五《关隘》，清道光十五年修。
- ⑦〔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
- ⑧薛凝度：《云霄厅志》卷十一《宦绩》，清嘉靖二十一年。
- ⑨徐规：《畬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载《杭州大学学报》，1962（1）；
施联朱：《关于畬族的来源与迁徙》，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2）。
- ⑩蒋炳钊：《古民族“山都木客”历史初探》，载《厦门大学学报》，1983（3）。
- ⑪同⑧。
- ⑫同②。
- ⑬《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记》七五。
- ⑭蒋炳钊：《畬族史稿》，166~168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⑮《元史》卷十《本记》。

⑯《元史》卷一六七《王恽传》。

⑰沈定均：《漳州府志》卷四六《艺文》，清光绪三年刊本。

⑱沈定均：《漳州府志》卷四七《兴祥》。杨澜：《临汀汇考》卷三。

⑲《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水云村稿》卷一三《杂著·汀寇钟明亮事略》。

⑳[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别录二·奏疏·横水、桶冈捷音疏》（十二年闰十二月初二日）。

㉑同⑦。

㉒《明实录》卷五四《太宗永乐实录》。

㉓《元史》卷一二《世祖本纪》。

㉔《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纪》。

㉕同④。

㉖同④。

㉗《元史》卷二四《仁宗本纪》。

㉘《元史》卷一〇〇《兵志》。

㉙《元史》卷一五《世祖本纪》。

㉚同②。

㉛[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六《人部二》。

㉜[明]谢肇淛：《太姥山志》卷中《游太姥山记》，卷下《游太姥道中作》。

㉝林春溥：《罗源县志》卷二九《祥异》，清道光九年修。

㉞张景祁：《福安县志》卷三《疆域》，清光绪十年刊本。

㉟周杰：《景宁县志》卷一二《风土·畬民》，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㊱郑培椿：《遂昌县志》卷一《风俗》，清道光十五年修。

㊲吕锡生：《畬族迁移考略》，载《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2）。

㊳周荣椿：《处州府志》卷三〇《艺文志》吴楚椿：《畬民考》，清光绪三年刊本。

③⑨杨澜：《临汀汇考》卷三，邓光瀛：《长汀县志》卷三五，民国二十九年。

④⑩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一四〇《国朝宦官·李殿图》。

④⑪福州《华美报》己亥四月，第17号第15页，清光绪二十五年。

④⑫〔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6册，福建《防闽山寇议》。

④⑬蒋炳钊：《客家文化是畬汉两族文化互动的产物》，见《东南民族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④⑭郑一崧：《永春州志》卷七《风土志》，清乾隆五十二年刊本。

④⑮江远青等：《建阳县志》卷二《舆地志·附畬民风俗》，清道光十二年刊本。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